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

→左起依序為陳添枝教授、劉遵義院士及何志欽教授。

導言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世界轉換很快，因應的挑戰也多，必須提綱挈領、看清生存挑戰的空間。自去年十二月講座定名為「承擔與試煉」，今春與何志欽教授共研推出「全球化下發展與分配的省思與挑戰」，因國際政治情勢對全球經濟影響甚深，必須思考在地因應措施與轉化政策。

主持人／何志欽（前財政部長）：

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有機會來跟大家討論關於經濟全球化下的所得分配問題，我和余紀忠老伯是多年的交情，余先生是位愛國並且高瞻遠矚的長輩，做為晚輩的我對他非常欽佩。

全球化下的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態勢

劉遵義（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我的民經濟福祉的最優化，一九七八年中國經濟革命的經驗可供借鏡，當時追求平等的所得分配，卻導致低經濟福祉與低經濟成長率。此外，鑒於每個人能力的差異，藉由累進稅率的適當選擇，可以增加經濟的總產量和整體福祉。所以，從生產最大化的稅務安排角度看，完全平等的所得分配不可能成為最優的選擇。

經濟全球化能提供一些開發中經濟體出口貿易的機會，使許多人能脫貧，尤其是造成東亞經濟早期的高速成長。例如，台灣的人均GDP從一九六五年未達三千美元，增長到二〇一四年的二萬四千美元。據估計，中國大陸有五億人民因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而脫貧，其他正在開發中國家也會受惠於經濟全球化。

所得分配不均的成因

然而，所得分配的程度在許多國家與地區（包括成功降低境內貧窮者）持續惡化，部分可歸咎於其境內所得分配的內在機制。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後，經濟發達國家包括歐、美、日等的央行，採行量化寬鬆政策，造成人為的極低利率，使資產泡沫火上加油，更加劇其國內的所得差距。另一方面，資本的流動性也使Q影響力遍及全球，亦增加開發中國家的所得差距。

以測量一國貧富差距程度的基尼係數觀之（附表一），課稅和轉移支付後的所得最為平等，墨西哥（〇．四八）最不平等，但俄羅斯（〇．三九七）及中國大陸（〇．三七）兩個一向被認為是所得不均程度高

表一、各國稅前、稅後的基尼係數對照

Country	World Bank Estimates of Gini Co efficients after taxes and transfers circa 2000s (percent)	OECD Estimates of Gini Co efficients before taxes and transfers circa 2000s (percent)
Australia	30.5	46.8
Canada	33.7	44.1
China	37	NA
France	32.7	48.3
Germany	30.6	50.4
India	33.6	NA
Italy	36	53.4
Japan	38.1	46.2
Korea, Republic of	31.3	34.4
Mexico	48.1	49.4
Russia	39.7	NA
Sweden	25	43.6
Switzerland	33.7	40.9
Turkey	39	47
United Kingdom	38	45.6
United States	41.1	48.6

的國家，事實上卻與英（〇．三八）、美（〇．四一）及日本（〇．三八）課稅和轉移支付後的基尼係數相差不多。雖然各國的所得分配都還有改善空間，但證據顯示課稅和轉移支付政策仍屬有效。

首先，所得分配的決定因素的基礎上，財富取得扮演大角色。容許較高所得分配的結構改變，租稅是一個長久制度，調整課稅政策的效果有利得，故從要素市場觀之，對所得分配更有直接影響的是要素市場，資本形成、技術變遷、勞動市場等海空運成本下降既，而英語作為商業使發明家與企業家沒有嘗試創新的誘因、跨國投資和技術授權的誘因也會降低。新興市場中無形資產的特許許經營是法良好的新概念，新興技術和經濟模式傳遞，也促進文化交流、提高國際相互理解，並減少可能的補救措施與對策

正視長期投資與短期資本流動

長期自願性的直接投資或長期的組合投資組合，對於投資國和被投資國的經濟成長有顯著差異，從生產角度來看，在生產過程中抽資的稅收，乃針對產業的贏家的利益，對生產者和生產者及附加費用的再分配。

第三是二〇〇八年後的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影響，Piketty認為二〇〇八年雷曼破產事件是一個關鍵點，但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提出的QE量化寬鬆政策，在短時間內又將它重建，反而更加速了金融資本市場惡化。這部份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總體經濟走向。

所得稅、遺產轉移稅與資本利得稅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做的是稅務政策，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稅制，其實是對產業的贏家的利益產業，在生產過程中抽資的稅收，產業2的消費者也是受益者，則在銷售過程中抽銷售稅，去協助那些產業的贏家例如產業2的取代產業的工作者，這將在產業界形成一個良好循環，但其實是因為產業1的取代產業2的工作者，雇主在僱用人力時有較多的彈性，非典型就業屬輸國最積極使用，故其失業率較低，台灣相對保守，失業率也相對高。

四、教育的影響

首先，高等教育的擴張，導致勞動供給減少，應有助薪資上漲而非下降；其次是高等教育擴張使非技術工供給增加，技術工供給減少，使技術工與非技術工的工資差異擴大。高等教育的擴張雖然也擴張了理工科的科技技術，但現在不太需要技職教育，二般性教育雖然教育知識，但是缺乏技能，因此現在不太需要技職教育，而通技術教育的新工科則較高。

另雖明鑫發授根據主計處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四年資料的研究，不同職業別月薪約差異，目前為六十二%，就產業別月薪約差異，二〇〇五年五十八%以上的比例愈來愈高，低所得層則愈來愈低，一二十年來絕對值沒有成長，當前台灣也面臨同此現象。

根據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的全球所得資料庫，以及朱敬一、林明仁、簡錦漢三位學者依財政部報稅資料統計，可以與其他國家的數字做對比，台灣上位十%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從二九七七年占二五．二一%到二〇一三年占三六．三九%，增加了十一．一八%。誠如劉遵義教授所言，台灣並非最壞的，依據韓國學者統計數據顯示，韓國上位十%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從一九九五年占二九．一%，和台灣差不多，到二〇一三年占四四．八七%，增加了十五．六七%情況非常嚴重。美國的數字更糟，其所得大部份集中於頂端一．%。台灣從一九七七年到二〇一三年頂端一%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增加了八．三七%，十%所得層占國民所得比增加了十一．一八%，大部份國家增加一%至五%．增加到十%以上，表示上層的人的錢愈來愈多，這是全球普遍現象。

全球化究竟發生什麼事？超級明星、頂端富裕者所得驚人。所得愈低化的人大，頂端富裕者所得愈高，以上兩個現象是相關的。

一、全球化的內涵包括貿易、投資資金流動、和人員流動

首先，貿易動造成要素所得重分配（參照Stolper-Samuelson定理），但出口國的相關進口國的變化方向相反，對產業結構的比例愈來愈高，低所得層則愈來愈低，一二十年來絕對值沒有成長，勞工員有互補性、外人投資使本國技術密集產業的比例愈來愈高，但技術性勞工薪資上升，但對非技術性勞工薪資有很大的影響。

五、勞工制度

首先，台灣沒有工會問題，並非是工會式微導致勞動所得份額持續下降，只有進步的工會才能有效的保護、退休金、並增加薪酬彈性，第三是非典型就業人口的增加，因為這些並沒有納入報稅資料統計，甚至可能低估所得愈低化的狀況，因為這些並沒有納入報稅資料進行